

1895年鼠疫：澳門的公共性防疫

以《鏡海叢報》為主要分析樣本

郭衛東*

鼠疫是人類歷史上傳染最烈的瘟疫之一，1894年，粵港爆發空前的鼠疫流行，咫尺之遙的澳門卻在當年未受侵擾。1895年，澳門鼠疫晚到，也祇是稍有感染，未見流行性傳播。聯繫到2003年春天的SARS，澳門也能獨善其身，澳門果真是一塊五毒不侵的“福地”嗎？本文以1893年7月18日至1895年12月25日行刊的《鏡海叢報》中文版為主要分析樣本，論述了公共性防疫乃澳門避疫成功的重要秘訣。

鼠疫在澳門周邊的流行及分析文本

鼠疫 (plague)，經典的病學釋義為：

鼠疫桿菌引起的烈性傳染病。一般先在家鼠和其他啮齒類動物中流行，由鼠蚤叮咬而傳染給人。常先引起淋巴結炎，輕症局限於此，重者病原體侵入血液，引起敗血症或肺炎，分別稱為腺型、敗血型 and 肺型鼠疫。後者亦可經呼吸道傳播而得。主要症狀有高热、出血傾向、極度衰竭等中毒現象。此外，由於臨床類型不同，尚有各自的局部症狀。鏈黴素和磺胺類藥早期聯合應用有良效。預防在於嚴密隔離病患者，滅鼠滅蚤，預防接種和加強國際檢疫。(1)

人類最早的鼠疫流行發生於西元6世紀，染病而亡近億人，這在世界人口並不很多的古代，是驚人數字。自那以後，鼠疫便成為“中世紀令人害怕的瘟疫。它們一爆發，就引起了一片恐慌。無數人逃離城市，躲避瘟疫，因為那時人們還不知道病因何

在，也不知道還有甚麼辦法能夠避免傳染”(2)。中世紀的西方稱鼠疫為“黑死病”；嶺南各地民間稱之為“惡核”、“核疫”、“大頭瘟”、“人瘟”、“瘟疫”、“控槌案”、“浮核”、“著瘟”、“粒總”、“腳邊浮核病”、“惡核病”、“歷子症”等。(3)

1894年，粵港爆發空前的鼠疫流行，據廣州老中醫易巨蓀稱：

甲午吾粵鼠疫流行，始於老城，漸至西關，復漸海邊而止。起於二月，終於六月。疫疾初來，先死鼠，後死人，有一家而死數人者，有全家死絕者，死人十萬有奇。(4)

有研究者認為，在當時人口150萬的廣州，“十萬有奇”的死亡人數略誇大，死亡人數當在七萬上下。鼠疫從那年五月初傳入香港，5月10日，港島被宣佈為疫區，“當時僅是6月7日那一天內，中環太平山那一個人口擠住得最密的地區，就死掉一百多人，而且又有六十多人被傳染上這種不治之症，立刻就鬧得人人自危”(5)。這一時期淋巴腺鼠疫的流行是香港早期

*郭衛東，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16-19世紀中國與西方關係史。

醫學史上最引人矚目的大事，疫病造成嚴重的生命和經濟損失。據港英政府保守確認，1894年香港腺鼠疫流行，患者2,679人，其中死亡者高達2,552人。⁽⁶⁾

令人稱奇的是，與穗港咫尺之遙的澳門卻在當年未受鼠疫侵擾，“去歲時疫流行，省港遍及，惟於澳門一隅獨享太平，幾疑天之待澳居民為獨厚。”⁽⁷⁾果真是天佑澳民嗎？不料，旋至次年，澳門好運不再，鼠疫開始傳播，其因又何在？

應該說，有關1895年的澳門鼠疫，並非沒有人研究，新近所見的賴文、李永宸先生的大作《嶺南瘟疫史》，就是一部對該地區傳染病歷史進行全面描述的傑出著作，但該著作有關1895年澳門鼠疫的研究，主要依靠《澳門憲報》為原始分析樣本。我們知道，《澳門憲報》是澳門政府的公文刊載，其紀錄角度側重於官方。為了更全面地研判1895年這一澳門歷史上首次鼠疫傳播，本文願以另外文本從另一角度就此進行論述，我們的主要分析文本為《鏡海叢報》，該報創刊於1893年7月18日，週刊，分別有中文版和葡文版（葡文版刊名為 *Echo Macaense*，直譯為《澳門回聲報》），中文版的終刊為1895年12月25日，可以看出，在中文版行刊的兩年間，正好是廣州、香港、澳門鼠疫相繼發作的時間段，故而，有大量第一手的真實具體生動的記述，它為澳門史上第一次鼠疫流行留下了珍貴史料，而有關此方面的資料，尚未被後世的研究者所注意。《鏡海叢報》的報主是澳門土生葡人飛南第⁽⁸⁾，所以，這又是一份民間人士創辦的報紙。《澳門憲報》為官方公報，而《鏡海叢報》係民間週報，因報刊屬性的差異，辦報者立場的區別，故而論述角度或有不同，兩種樣本可從不同視角互相補充糾正。本文以《鏡海叢報》為主要分析樣本，以求更全面揭示這場瘟疫及澳門的應對。

遲到的澳門鼠疫及公共性應對

1894年，粵港爆發鼠疫，澳門獨善其身——

不料，自冬及春，自春及夏，始而日病者數人，繼而日歿者數十人。（……）人心惶惶，各

自為計，悵禱天之乏術，惟避地以圖存，因此遷回鄉者有之，遷往港者有之，遷去省者有之，其不能離澳而家資殷實者，亦以舟作陸，河上逍遙。每當夕陽初落，樓閣上燈，則店皆閉戶，路少行人，市情之冷淡，為數十年所未睹。而福隆新街、甯居為一帶繁華盛地，更門庭冷落，車馬稀疏，十室九空，無幾存者。而關閘門外，新塚累累，素冠載道，更為目不忍睹，耳不忍聞。⁽⁹⁾

當粵港鼠疫平息，原本風平浪靜的澳門卻又疫症蔓延。有關澳門鼠疫各種情況，《鏡海叢報》給我們留下了豐富記述。

關於澳門鼠疫的傳入途徑，自來有兩種說法，第一種是北海傳入：

惟以去歲北海起疫，延至澳之沙欄仔，於時諱莫如深，祇知專掩鄰人耳目，不知查禁外來船隻，先事嚴防，以致北海埠染有疾疫之豬畜混進澳門，奸商偷宰，貧民貪圖，私相買食，傳染日廣，積之又久。近時官醫始行查悉所屠各豕，內中委有生蟲之事，極為申禁，而事已遲矣。⁽¹⁰⁾

更多的還是認為從廣州或香港傳入：

澳無時疫之說，因係所患之症皆由北海傳染而來，或緣省港舊根苗芽復發。⁽¹¹⁾

澳門疫源說法不一，重要原因在於早期沒有建立死亡報告制度。

（澳門）報死之冊，未見舉行。此事雖非關係緊要，然而外埠通商之地，無處不舉行此例，獨澳門則否。（……）惟係關閉外所葬之人，每月例於憲報刊登一次，男若干名，女若干口，孩童若干，雖不能報無遺，十漏得其八，願亦可云，幸有此舉”，按照1894年“憲報”的記錄，西曆8月死亡人數為一百一十九人；9月為一百零五人；10月為一百二十人；11月為二百二十

九人，12月為三百十二人，1895年1月為二百零一人，2月為一百五十人。根據上述死亡數的分析，有時人推測“西去歲十一、二月疫氣已甚矣。何以知其然，計其死亡之數，額外增多，非疫而何？況有從水道而赴對海者，尚不知若干數目乎。如果設有報死之例，則西洋政府按冊而稽，忽見其喪亡之多，自必警心震魄，急行密查，便知澳地有疫，先為預防，不致如今日之蔓延甚廣，流禍無極矣。”⁽¹²⁾

照此說來，澳門自1894年底即已經鼠疫流播，不過，這僅祇是推測，缺乏直接佐證。1895年仍被公認為是澳門歷史上首次鼠疫流行的年份。澳門的疫死人數也是一筆糊塗帳，澳門疫情盛時，香港政府曾派官差王永年到澳瞭解情況，據澳門潔淨局和新設立的“呈報死人處”提供的資訊，到西曆4月20日，“福隆新街有一妓屋，共死三十餘人，計妓九名，已死其七，祇餘兩名澳妓逃至香港。”但據細查，實際上那裡每個妓屋（包括人數最多的“合心樓”）的人員最多不超過二十人，不可能死出三十餘人。澳門當局“張大其辭，混據風聞，糊塗呈報，似亦失職。澳港相連最近尚如此，其虛謬況有遠於澳門，則更不知若何？”⁽¹³⁾看來，官樣報告疑點甚多。

關於澳門的重要疫點，《鏡海叢報》亦留下原始記錄。澳島最早出現鼠疫的或是沙欄仔。

去歲省港並疫，澳獨無事，群相喜慰，心乃竊竊，然憂之以為人心之惡，愈積愈厚，未必此方而並良也。去冬之杪，於報端勸人修善消災。蓋其時沙欄仔一帶已兆先機，延至春時，似已成象。⁽¹⁴⁾

疫症最嚴重的是水手東街——

街口有第廿一號門牌之屋，連旬之內共死九人，兩小孩、兩女子、四中年婦、一老叟。此屋乃係破爛洋行地庫寬廣，貧民分賃而居。⁽¹⁵⁾

再是福隆新街——

廿五晚，街內有妓名成就，沾有時疫，貧不能去擁鬢挑燈，養扇斗室。⁽¹⁶⁾

還有石角嘴、龍嵩街等地——

石角嘴一廠更多，手到春回。惟初十日最甚而已，然商民猶未大定，遷者依然，去者未有歸志。蓋因時疫如水之流，此方雖已安瀾，彼處又復蕩激。如本月初旬之龍嵩街蘭記西菜館東許某，可謂寒心，計其前後不滿三日，全家眷屬告逝紛如，先亡其外舅母，遂及其婿，並婿之弟，然後乃及其身。先一日許尚會客飲酒，開匣取具，乍見腐鼠兩頭露於飲具之側，臭氣直貫鼻端，急覆藏之，而別遣人料理，席甫終而病作，延至次晨，遂乃不可救藥。⁽¹⁷⁾

根據疫情猖獗的地點來看，易感人群主要是貧苦人家，他們居住環境差，人口擁擠。再是娼寮妓院，人品流雜，外來人多。另外，與生活習慣相關——

現聞所死之眾，華人多，西人少，其故何哉？華人多不顧其住居，不理其服食，每屋之中，常至歲尾才一滌之其衣之汗，幾欲生鹽竟不思洗；更有屋窄人多，略開小窗，又常關閉，此皆致病之由也。試觀疫盛之區，常在最汗之處，可以思矣。⁽¹⁸⁾

關於疫症表現，《鏡海叢報》的描述與近代腺鼠疫的科學典型症象或有區別，但亦可作為參考：

毒入與腦，所現病形可以知其故者有二：一係腦膜腫脹，一係腦血流潰。初起之時，頭覺甚痛，額端及兩太陽穴或發大熱，病勢驟起，其狀必劇，久而久之，其病亦隨時而減，不若前時之利害矣。頭覺有痛，定係兩太陽（穴）跳躍，有些病人並見後枕骨作痛，曾見兩人自云頸項皆

疼，因係毒在背脊骨而起。頭痛而若係腦膜腫脹，其人必發胡話，兩眼歪斜側視，或作左右視之象。如果腦殼之內或有血出，則在其人眼珠可以察驗。（……）又有在人身上分開片塊，顯作豆形，其色殷紅者，醫生疑為蚊口，因乃醫院最多蚊也；更有身上之血，略用手指掐之，即覺血色凝結，或用手擊，或用鐵簽刺之，均能刻即變色。（……）大凡病人初染患時，便行結核，此等之症，尚屬順手，不甚厲害，有些病人起核之後，久而不散，逐漸堅實，（……）起核之症，曾經救活者，多係穿潰流血；亦有其核散開，變成一片之形，患從內消。（19）

但澳門鼠疫卻蔓延有限，不像廣州香港那樣死亡人眾，波及面廣，而是很快就被治理。這裡，公共性的防疫發揮了最重要的作用。防疫的公共性是近代的產物。鼠疫屬於烈性傳染病，傳染面無人不及，故而，防疫的公共性頓顯重要，在這方面，澳門有諸多值得稱道的作法：

其一，構建公共預防體系。面對烈性傳染病，建立公共預防體系十分緊要。

疫氣未盛之時，當思預先防治之法，應擇醫院之內，周時通風，所在無論係受病之人與及受工人役均該如是。但係所僱工眾在院服役切不可身有傷口，與夫皮膚微有損破。所有衣中等宜用加布瀝油並以燈火一照，將要架獵多藥油放在燈火之上煎之，使沸油氣蒸蒸昇騰滿屋，俾得化去惡毒之氣。（……）大凡病人在院，切需常將熱水為之浴身。（……）院內工人倘有略見頭痛、身或微熱、神疲、喉燥等症，立須遣之出外，別尋第一通風之所，著其靜養。（……）屋內積存糞草，即刻投諸烈火。（……）疫蟲凡有血能到之處皆可以尋出，此等蟲，最多所在係已經結成毒核之內及身之脾經。（……）似係結核形狀，試以布瀝油一百分之一浸蟲於內約一點鐘則死矣，百分之二浸之即時便死，納入白灰亦然，將蟲放在通風處所，四日便斃，即不速斃，決難

滋盛，暴日曬之，便不堪毒人矣。凡沾是疾幸得過至危至險之時，約延六禮拜之久，刺驗其血，尚有疫蟲，殆至疫氣將衰之候則竟無矣。（……）華人醫院兩月後即許外出矣，傳染之道最屬堪虞，可以帶附別去，以故有疫之地，必應嚴禁外來船隻，限以四十日方准登岸。（……）如有親友赴探病房，其一，當用工役跟隨其探候病人之後既相晤對，許之講話，至久約五邊尼鍾，不得任令探候之輩以手貼摩病人身體；其二，若有願留院內扶持其所探候之病者，應照院內工人一律約束，如欲出院，須先安置清潔之地居之數日，方許放行，一切器物，皆須遵照醫生條矩，用藥熏滌云。（20）

1895年，鼠疫突破澳門的防疫線，促使澳葡當局開辦常設的醫療檢疫機構，由議事會頒佈〈創設醫館規條〉，就在議事公局的樓下成立公用醫館，經費由政府支付，該機構堪稱澳門最高防疫管理機構，醫館總理由醫局醫長輪派官醫出任，醫館職責是接收疫情和死亡報告，準備“除穢藥料”，監督民眾“按照衛生事例妥為辦理”，對死亡者逐一驗屍，如“疑係因奇異病症身故者，須立即報知醫局，俾得前往料理潔淨”；逐次登記亡故者，頒發出葬憑照，澳門過去並無嚴格的喪葬報告制度，民間又流行長期停屍的習俗，很不利於疫情防止，為鼓勵民眾如實並及時申報，還規定凡是領有殯照，按照規定時間出葬者，免除其喪葬費用。就是通過政府行為設法掌控本地疫情動態和消除潛藏的瘟疫傳染源。（21）為增強公共防疫體系，葡澳當局還從葡京里斯本調配醫務力量——

澳地西醫不足於用，近由西洋京城派調官醫亞魯祚來澳，藉資臂助，不日可到。（22）

民眾也被廣泛動員起來，自覺嚴防死守——

對海之沙尾、柏山一帶，凡有外來人眾，面貌可疑，非屬本村者，守村更練阻不令進，防病馬之亂群業，殆亦防衛鄉間之善法。（23）

其二，建立公共隔離機制。隔離病人是遠古即有的方法，《聖經·利未記》中就有隔離病患的指示。14世紀歐洲黑死病大流行，城市大規模隔離被廣泛採用。

1377年，拉古薩城採取措施防止瘟疫患者進城，把所有可疑的人都集中在城外一個地方隔離了一個長達四十天的時期。巴黎在1533年發佈瘟疫法令，命令呈報和隔離所有瘟疫患者，禁止運送感染的物品，堅決要求清掃道路和貧民窟，撤空瘟疫死者的住房。倫敦在1665年大瘟疫期間也做倣巴黎。⁽²⁴⁾

儘管人們還不知道鼠疫是細菌引起的，但是細心觀察的人發現這種病具有傳染性！（……）為了對付這種害人的接觸傳染物，從15世紀開始，很多醫生在進入瘟疫醫院前全副武裝，穿上幽靈般的保護服：他們從頭到腳都被套在一件油布做的大長袍裡，戴着鳥嘴狀的面罩，裡面裝有消毒作用的芳香物質，一副裝有水晶玻璃鏡片的眼鏡保護著他們的眼睛，以免受到“毒氣”侵害，他們的手上戴著一副大手套，手裡拿著長長的指示棒接觸病人，指導治療。孩子們在街上看見他們時，一邊大聲喊著“鳥嘴醫生”，一邊飛也似的跑開。⁽²⁵⁾

中世紀的歐洲因瘟疫發生，還衍出避暑習慣，黑死病“從春天起便開始成為災害，一直延續到冬天到來之前。”富人們到鄉間別墅去度假，並非完全是為了躲避熱浪，還是為了到地僻人稀處躲避瘟疫。⁽²⁶⁾ 人群規模隔離是西方的防疫方法，中國傳統上並無此法。但當疫情爆發時，中國百姓也有自發舉家遷移，分散野外，脫離疫區的作法；中國自古也有專用於隔離瘟疫病人的“癘所”。澳門緊鄰粵港，為防鼠疫傳入，澳葡當局於1894年5月15日頒佈條例：

所有由省城或香港來澳之船及火輪渡船並火輪渡等，務須委醫局醫生於各客未登岸之先，詣船查看，倘有華客生有疔瘡疫症，或疑其患此症

者，尤須留心閱視，是為至要。水師巡捕統領宜飭屬吩咐各項船隻由省城抑或香港而來者，若疑該船內人有病症，則不准登岸。倘查出果實有患病者，應將其人留於船內，隨即照知醫局醫生，俾得前往驗視。”外地來澳“無論火輪渡船及小火輪渡，各人患有此疔瘡疫症者，則不准其登岸。如有夾板並桅船或搖槳之各船隻人等患此症者，應立即用火船拖其出埠。⁽²⁷⁾

6月，澳葡當局又頒行《辟疫章程》：規定各類船隻在指定地點靠岸；水師、警員在岸邊巡視，以防船隻在規定以外的地點登岸和人員擅自入境；無特殊情況，晚間任何船隻不得與岸上人往來；白天由關閘路徑來澳者，必須經官醫驗視後准入，晚間無論何人俱嚴禁由關閘陸路入澳；養生局負責向各入關處派駐醫官嚴密守查；監督街道房屋的清潔；所屬各離島也照款辦理。澳門彈丸之地，與廣東、香港之間的通道有限，加上實行一定範圍的交通管制，在關閘和碼頭採取嚴密的陸海檢疫預防措施，1894年竟得以在粵港鼠疫的包圍下安然無恙。

對於染疫者，則在澳門就地設立隔離區。主要設三類隔離區，一是醫院及附屬隔離點，這是重點防範地帶。澳門紳商在自然瘟疫面前，表現出高度自覺，為澳門防疫避疫做出突出貢獻。公共性一個重要表現便是民眾的廣泛投入，或相當程度上的公益性——

前錄華人商紳擬在灣仔建搭大棚廠一座，安置病眾，頃已在廳官處稟准，（……）澳中華紳盧卓之、何穗田竭力襄助，立督工匠人役擇得石角嘴地方附近拱北關分廠海旁墻區，建成大廠，分作兩層，約容數百人之廣，即日分將醫院二十名運載赴廠，臨時時一人告斃，共得十九人之數。何、盧各題捐善費銀一千元，公棧亦助銀千元，在籍候補道陳芳捐銀四百元，其餘紳商並解囊以相助，多寡之數，各視其家之有無。甚善舉也。⁽²⁸⁾

該隔離病區辦理得頗為成功 ——

石角嘴新設之鏡湖醫院分局，既得地利，復竭人功。蓋濱海臨水，絕無地氣之昇騰，四面生風，所有疫氣而蕩滌。各等工役人眾照料周詳，遇有病故，統照華人規程，西醫不行過問，緣是人心歡暢，不起驚惶，安心調治，凡進斯廠者，多有回春。云該廠紳董何、盧兩商，既捐資財，又復不憚勞苦，按日赴廠指點，故人人不敢偷安。(29)

二是發病區 ——

廿五晚，（福隆新）街內有妓名成就，沾有時疫，事為西官所悉，慮為傳染房屋，立飭黑車一具，載赴醫院。（……）是日，有某宅雇喚街車，載其八齡幼女前赴醫院，於例不合，西差將車拘赴捕房，車夫當即保釋。車待熏滌，交給公司備領。現時西官深慮時疫傳染，別用手車全行漆黑，以異夫街車者，專載病眾。(30)

染病地區自成一隔離系統，不得隨入，交通工具也嚴格區別，特別標示，使得疫區和醫院兩點之間的往來交通全線隔離，避疫消毒措施可謂嚴格。

三是海上小艇，根據澳門人口密度大，陸地隔離區畢竟有限，並難以全面隔離的顧慮，而建立海上隔離區。疫情期間，澳門方面就已觀察到：

其有未曾染恙之人，最善係遷諸水次買艇而居，因乃疫氣不到蛋民之處（實際上是鼠蚤不宜到水處），省港均著明驗人既移居蛋艇，岸上之眾不能廣為傳播，時疫何能住腳。(31)

除了健康人眾到海上避疫外，病患者也赴海上隔離，水手東街“屋內有周姓婦，其女初患發熱，移居小艇。(32)

但隔離措施亦有不足，水手東街儘管死亡人眾 ——

現在所移人戶，尚計數家，訊何以不遷，對以無屋肯租，仍伏處於一室。按例，疫死當即呈報，派發差役用藥洗滌，然差少地廣，或隱匿未報，類難遍查，西官又恐民逃，不肯操切，查有不報，弗敢嚴罰示警。所以疫死之屋，多有依常居住者，僅就所知而言，已可歎謂，況未知之屋，更且多眾耶。願望西洋官速擇各段空閒之地，搭建棚廠；或非患疫而先遷之屋，婉向業戶商借安置此等貧民，一俟事平，照常散居。(33)

隔離措施有時又未能及時察視疫情，做出調整，以致過猶不及，如香港對澳門的超時隔離便引出澳人抱怨 ——

近來澳疫已靖，由省港而來者，每日紛紛不絕於途，獨由澳門赴港則仍照前不准，未審延至何日，始能大開禁例。(34)

其三，完善公共衛生體系。鼠疫主要依靠動物宿主即鼠類和昆蟲媒介即跳蚤等傳播，所以環境衛生特別重要。

去臘沙欄仔一帶時有不潔之居藏納病人，華政微有所聞，即率暗差嚴為搜查，各等不潔之屋亦一律督令洗滌。下環街陰巷常有遺矢於途，西差禁無可禁。惟常行巡視，潑以辟穢藥水。(35)

水質特別是飲用水的清潔也引出人們的特別關注，1895年，恰逢 ——

春時少雨，亢陽致疾，雖曰天時究不可不賴人事而補救之。近聞各街巷之貧戶多有食井乾渴，求水艱難，前請雇派民船，別用小輪拖帶前往銀坑取水，以濟民飲之議，何以至今而不舉行。（……）西洋官購備辟毒藥料，沿街焚燒，辟穢藥水，沿街灑潑，加僱掃夫，督除穢惡，似亦先機預防，處處周密矣。(36)

澳門的一些地區原有收購出售舊衣物的營生，在大疫面前，顯得特別不衛生，正是跳蚤臭蟲蟲子最易孳生的處所，澳門官民同心協力革除弊端。

三巴門各街雜架店並草堆街一月押等舖均藏有破爛衣服，穢垢不堪，或從病死之身剝脫而來，亦未可悉。亦之轉售，深虞貽害他人。即使積藏未售，氣息蘊結，亦決不利於本店。廿四日為梁華政查悉各店之內藏有此等穢惡衣服，立帶暗差赴店搜查，統將所藏破衣及穢垢布料，按斤給錢，抬到媽閣海旁空曠之地，取得火油二十箱，發火焚化。於時各店俱謂奪其利益，如此辦法破耗資本，多不欲遵，間遣婦女由頭哭，繼以咒。華政毅然不顧，照價收物，略不為動。此則剛斷之太可嘉也。旋聞各件作多有抬屍至墳，盜取其衣入澳典賣者，乃遂馳赴各殮工之寓查搜，果得積衣甚夥，責飭數言，取而焚之，並不給值。即論守關開之西兵，遇有抬棺人役葬畢而進者，務須搜檢其身，藏有死人衣服，拘解候訊。⁽³⁷⁾

因為利之所在，某些貪利之人竟敢企圖蒙混以身試法，在鏡湖醫院焚燒收繳穢衣的工人“從衣中檢出值錢者”，於是將衣服“蓋懷藏將典賣”，輿論要求澳門政府督促院方嚴加查處⁽³⁸⁾。

疫症期間，澳門還普遍採取了全民動員的全島薰蒸法，就是在統一時間，全澳同時點燃藥氣，對各種病毒進行滅殺。此法在西方早已行之，古代歐洲，“為了消除空氣中的毒氣，市長命令人們在空地上點燃木柴堆，在狹窄的街道和公共建築裡熏香料”⁽³⁹⁾。薰蒸法在澳門實行可謂中西合璧。

現在西官日為整潔民居，沿街焚燒鬧穢各藥，地廣力微，似無甚益。不若民居各自焚藥，同時舉辦，則藥氣薰蒸，通澳結成祥瑞矣。⁽⁴⁰⁾

此法澳門市民以為新奇，也頗願意接受。

更有最妙之術，莫如齊將辟毒藥分早晚兩次，通澳齊燒，其氣蒸蒸，疫無處藏，必將消退。若慮貧家無資，可赴公局取藥，早晚兩次後，因其餘熱而焚之，不須買薪。⁽⁴¹⁾

內中所載的免費發放藥物，使得貧窮人家亦能同時實施，正是構建近代全民共用的公共衛生體系的最基本要義。因為有廣泛參與，民眾的監督也非常踴躍——

通聞人言，潔淨局人役頃以勤勞過甚，遇有亡人之屋，僅用硫磺熏灸，不似從前之奮力常開機管灌藥極射，云有時停屍於室，待醫赴驗，竟過一夜之後而始埋，患疫之屋卻不著人搬遷，聽其留住，赴葬之屍混同一處，粵俗數年之後多有檢骨，其旁當有疫葬之墳，發土播揚虞沾穢。⁽⁴²⁾

此種薰蒸法據說十分有效，直到民國年間，福建等地爆發鼠疫，也經常性地採用此法。⁽⁴³⁾

中醫作為中國的傳統醫療體系，在澳門這樣一個中西交匯的地區有着不可它替的作用，也是澳門公共衛生體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華民於此有特殊認知。既為全民防疫，民間社會積澱了大量藥方，充分發揮民間智慧，亦為題中應有之意。

天通街有鄧雲山醫生，名貴修，前在鏡湖醫院施診，今有醫論一篇，良方數條惠到本報，囑為刊登，以期公而濟世，其中皆言時疫，措意起奇。（……）據言業經試驗多人，因分錄其方以待酌：正珍珠末、正土牛玉各二錢，金絲熊膽熬酒融化曬乾；正田七各三錢，箭爐麝香、正蟾蘇、柴胡、羌獨活、蘇葉、只殼、尖檳、法夏、黃芩、蒼術各五錢，葛根、麥牙俱八錢，川樸、甘草、藿香陳皮四錢，研末為散，每服七分，用瓶存好，小兒分半服用，或清茶，或白滾水具（俱）可，先服此散一瓶，亟訊病人每日有大便否，如見便結，約三兩日不遺矢，照下開方服之：衛茅一兩，樸硝、生軍俱後下，扁畜、柴胡各五錢，川樸後下二錢，羚羊先煎，蘇梗、法夏

各四錢，祇實三錢，桑白八錢，酒芩六錢，服後若每日已有大便三次，照下開方治之：先服散，後服藥，防風、柴胡、木通、川連、羚羊先煎，地榆各三錢，犀角先煎，川樸後下各二錢，石羔、衛茅各一兩，黃芩五錢，若見發燒，乍寒乍熱，頭昏起核，口乾苦渴，便短心痛，即服此方，二三劑必能應驗。平素體弱氣短，身部作核，乍發寒熱，而不見口乾苦躁者，是謂陰症，立服下列此方，斷無不驗：鹿角、膠下後、附子、大歸、比白、芥子、酒芍各三錢，玉桂去皮，藥水局四分，大熟地一兩，灸草錢半，幹薑二錢，麻王七分。(44)

其四，推行公共疫情報告制度。澳門原無疫情報告制度，鼠疫期間，特頒〈醫館規條〉，以法令形式硬性規定醫生“疑係因奇異病症身故者，須立即報知醫局及華政務廳”(45)。就是建立疫情官方報告制度。

家有疫人，立即馳報金罷刺即舊議事庭之議事公局也，循章往報局紳，自會料理，一切周全，貧民不必破耗，官為出資，抑奚庸自費精神雇街車而犯例。(46)

最為難得的是，祇要及時報告疫患，便實行疫病患者的免費運送和治療，這是公共疫情報告制度真正能夠實行的必要前提。民間報刊對疫情有始終如一的不間斷報道，開設“時疫彙記”等專欄公佈疫情。

去歲冬間，復傳至澳，春夏之交，氣勢頗熾。(……)前禮拜內澳中各妓寮尚覺照常安靜，近則奔涉將空，十家九閉其門。新圍一巷，全行遷去。福隆新街僅留四五家。細查疫死之人，福隆新街則有金佩蘭之婢，新圍五妹，白眼塘華彩妓之遭患者約略可數；然在本屋而亡者僅金妓之婢，餘或走匿前山，奔赴省城，然後斃命。(47)

妓院來往人多繁雜，既是疫情傳播的重點，也是消息流播的場所。風流文人，憐香惜玉，為風月場痛惜，每每以此賦文，從異樣角度透露疫情：

紙醉金迷之穴，花天酒地之場，曾幾何時，雲散風流，不僅有人面桃花之感，走馬章台，今昔異觀，蓋第見連房寂寂，綺閣沈沈，一領青衫早已啼痕數漬矣。連日福隆新街各妓屋，祇見奔遷，殊不見有還巢者，入夜通街寂然，燈昏窗暗。(48)

真是往昔煙雨繁華地，今日孤客斷腸人。

其五，改善公共環境。在這個領域，進行了三項影響深遠的工作。首先，改造如廁環境。

澳地行人，不論中西人士，每每於路隅陰僻之地私行便溺，積穢熏人，行客掩鼻。如爐石堂、果欄街、十六柱旁各橫巷內及下環街之陰巷，均有如此之弊。應速派人洗滌，禁人便溺。修人事，以待天時。(49)

為方便人們，維護環境，澳門總督下令：

將澳內所有損身致病之源，再加清理。乃近聞各家廁所，殊失妥理潔淨之道。其因而斃命者，未始不出於此。為今之計，自宜速籌良策，盡絕根株。

根據澳督命令，澳門管理華人事務的官員也頒令：

西官近以各家所建糞坑有礙生氏，華政示悉，澳定於五月十六日起限期三十日為止，一律糞坑統須填平，改用糞缸。自出告示十日之前，有廁之家，須赴糞政廳呈明聽候派查，堪用藥熏洗方得興工填塞，如違治以抗官罪。(50)

廁所如不潔淨，便宜滋生毒蟲鼠類和病毒細菌——

梁華政查知是街橫巷內有陰廁一間，建不如法，氣息蘊結，播而為患。特將是處之附近鄰居並其廁所，統行封禁，限令五日之內盡行遷移，不許人住此。則可謂深有救時之道焉。⁽⁵¹⁾

除對私廁進行改造外，輿論還呼籲，根據澳門實際情況，興建更多公廁，更重要的是，當局除制定計劃外，還應檢查計劃的落實，以免徒具空文。早在1894年4月14日，澳門議事公局鑒於——

澳地人居稠密，店戶繁多，計其人數不下十萬餘口，日有所食，則必有所宣洩，此理之自然。顧計自能設廁之家，十不得一。澳中屋租雖平，屋宇亦大第比惟中上之戶耳。貧寒居處，舉目皆是床榻，且不得安舒，而何望夫設廁。各等小店，更惟其屯貨經營，安有餘地，則籌所急耶。以故遇有內急，賓士數百步而竟悵然無以自解者所在恆有也。

所以通過議案，在澳門全島增設公廁八間，以方便居民。並與承包人區芳訂立修建公廁合同，限期修建完畢，但時過數月——

雖未屆期，然亦相去不遠，曾未相有地基，備有材木。豈待臨渴而掘井乎！豈合約乃是具文，盡可延緩廢藐乎！各等商民多欲急建公廁，以便其私。願西官之早留意。⁽⁵²⁾

其次，禁曬糞餅。嶺南村民原有在空曠地暴曬糞餅的習慣，以儲存糞便，按時令田間施肥。但此舉污染環境甚大，除不雅觀外，還招惹蚊蟲，臭氣熏天。為此，澳門當局在瘟疫流行期間頒佈強制命令，禁止再曬糞餅。

茲查本澳及附近等處，向以糞料播田，以尿水灌溉花菜等園，殊與保衛民生等事大有妨礙，亟宜力除其弊，是以擬自西本年五月初一日即華四月初七日為始，即將下列各條嚴行禁止，如有

違反，定必治以抗官之罪，各宜凜遵勿忽。一、無論澳內何處，概行嚴禁堆儲糞料尿水。二、在本澳及附近等處嚴禁做曬晾糞餅。三、嚴禁以糞料播田，以尿水灌溉菜蔬。四、所有澳內及附近等處曬存之糞餅堆，准於西本年五月初二日即要搬清出澳外，如違，即將該糞餅充公，仍使上憲發落。⁽⁵³⁾

此舉當然影響到村民利益，引致村民抗議，澳門當局為了公共大局，仍持堅決而強硬態度，甚至不惜出動軍隊來推行。

望廈一村，近時派有西洋戎兵多名，駐守村外，因是為口紛騰，有謂因禁村民曬糞，寰聚耕農數百，稟乞循照前章，刪除此例，澳官不准，民情憤然，故派兵以預防也。⁽⁵⁴⁾

再次，禁私屠亂宰。瘟疫發作，動物傳染源格外引起關注，有人就認為澳門鼠疫的發作最早是由北海地區引進的豬所引致，故而，嚴禁對病畜私屠——

昨有屠人私將出痘之豬一口開宰售買，業經割過半，始為巡差知覺，拘送於案。現時澳中議事公局新更局員，增刪舊章，其巡查局差近復增加兩目，別為正副，以督各街散巡，似應遇事加勤，時為查視，以免細民貪利屠病畜以傷生。⁽⁵⁵⁾

其六，強化公共衛生意識。疫病流行，人們對突發性的自然現象難予解釋，使得民眾轉而乞求神靈干預，認為這是“厲鬼為災”，“瘟神出巡”，將其歸於“鬼域”或是“神界”，故而將瘟疫與神靈聯繫，建醮祈禳以驅疫氣，有“送瘟神”之稱。疫症猖獗日，也是迷信極盛時。

近有蛋民某自稱為閻魔王之婿，能向陰曹說情，可以保全人命，倘造其處，求乞壽元，定免疫劫。此次澳地之災，實係陰司怒人不道，如能改過遷善，速具香燭財帛祈求，自蒙神佑。僱備小船一隻，逍遙河上，引惑愚民，藉求財利。曾

赴醫院，箚惑紳董，請建高臺，丈尺如式，每日送進病人四名，登臺可以救活云。澳官聞而惡之，將行執懲，某已知風，移泊華界。(56)

還有人稱：

時疫因係某處有大蛇一條，噴毒中人，以致各處居民受其毒害者互相傳染，宜用老糠半斤，鹽四兩，延門焚燒，方辟其毒。當時以為邪謬，笑其虛罔。不意，前數日，沙崗某炮竹廠內各店伴因欲掃除積垢，統將所有堆存之炮竹舊箱移開，甫將竣事，箱旁露出大蛇一條，張口吐舌，騰擲而前，眾伴驚呼，各持器械奮前圍擊，當將蛇首擊碎，橫屍街前，度之計長一丈有奇，權得數十餘斤。則昔之所造扶鑾仙語雖等無稽似此而觀殆，將益神其說。(57)

訛言流言紛傳之際，強化公共衛生意識，宣揚科學，消除迷信為平定人心的當務之急——

連日所報死冊，多不過八九人，少僅四五人，均屬時症而斃也，可見徒媚於神，祈福巡遊，殊屬無益，必盡人事以遏天災。(……)五月初一日，有等愚民竟視此日為元旦，以為改歲即免劫運。(……)又有訛言，有神降於馬留洲，附言初四日各戶之前當以糠一斤，鹽四兩焚之，自可消劫，是日米糠為之漲價。(58)

作為公共輿論工具的《鏡海叢報》等多進行解除民眾疑惑，宣傳科學道理的工作。但在疫症流行時期，有些行為則屬於宗教性質的祈福，顯現澳門作為多種宗教和睦共處的多元文化意境，表達人們戰勝疫症天下安康的良好意願，體現民眾送除瘟神的喜悅祝福。澳門多有這方面的活動，不應簡單地以迷信視之。

神道設教，中西同然，第所奉之神各異耳。天主教中，內有神名聖羅忌，云能制疫保安。由十六日起，西邦持教之徒科集錢文，分赴大廟及

龍嵩廟，誦經祈禱，求澳地之平安，共連九日而止，西紀本月十九號，仍奉斯神巡行街道。(59)

連日澳中各教堂男女奔趨異常鬧熱，皆因頌贊真神，而至蓋緣澳之時疫已靖，追念神恩，同為酬謝。(60)

澳中連獲大雨，滌洗管道，淨無塵渣，所有時症，漸慶安平。惟係平昔疫未到之區，劫數難逃，微為未靖耳，以故澳中紳眾，擬將日前所迎陳綏靖伯及各仙靈再在澳中巡行三日，擇於十六日奉駕還宮。(61)

通過一系列措施，澳門疫情平息，《鏡海叢報》於1895年6月26日宣稱“時疫已靜”，說是“前錄下環水手街一帶，尚有病疫之人，或一二名不等，今已安平，一律咸告無急”(62)。並報告“現時澳疫已靖，商場漸旺，民生大安。”(63)

鼠疫病源學的發現及澳門避疫之謎

鼠疫、霍亂、天花是人類疾病史上傳染最烈的瘟疫，歷史上，鼠疫世界性的流行凡有三次，即西元6世紀中葉東羅馬帝國的“查士丁尼瘟疫”，西元14世紀蔓延歐洲的“黑死病”，而第三次就是1894年始於穗港的腺鼠疫大流行，這次鼠疫以香港為傳播源而蔓延到東亞、東南亞、印度洋地區乃至非洲，成為那個世紀末的世界性傳染病。但近在咫尺的澳門卻僅祇是稍有感染，未見流行性傳播。那時間，香港的一些機構曾遷到澳門以躲避瘟疫，如基督教會創辦的“九龍心光書院”(Blindenheim School for Blind Girls, Kowloon)就曾一度遷往澳門(64)。澳門在疫區核心圈子中獨成一塊“淨地”，聯繫到2003年春天的SARS，澳門也能置身事外，澳門果真是一塊五毒不侵的“福地”嗎？

這裡要提出一個關鍵問題：就是病源的問題。

古代的人們已經直覺意識到鼠疫的流行或與動物有關。“不要吃動物翅膀、水鳥、乳豬，不要吃老公牛肉，千萬不要吃肥肉。”(65)鼠疫被認為自明朝萬曆九年(1581)就已經在中國的某些地區流行(66)。

而老鼠與疫病間的關係也早有直觀覺察。相傳作於1792年的雲南學人師道南的作品《鼠死行》曰：“東死鼠，西死鼠，人見死鼠如見虎；鼠死不幾日，人死如圻堵。晝死人，莫問數，日色慘澹愁雲護。三人行來十步多，忽死兩人橫截路。夜死人，不敢哭，疫鬼吐氣燈搖綠。須臾風起燈忽無，人鬼屍棺暗同屋。烏啼不斷，犬吠時聞。人含鬼色，鬼奪人神。白日逢人多是鬼，黃昏遇鬼反疑人。人死滿地人煙倒，人骨漸被風吹老。”但古代中國人對鼠與疫之間鏈結的認識還是模糊不清。西方人也沒有認識到鼠和疫間的關係：“幾千年來，大部分人（包括醫生）都把瘟疫看做是超自然力量的暴行，或把它看做是星象不吉利以及土地、水和空氣發臭時有毒物質所帶來的自然災害。但從古代到近代，也有個別醫生和自然研究學者認識到瘟疫有活躍的傳染物，並把這種想法告訴公眾。”其中便有生活在凱撒時代的古羅馬學者瓦羅（Marcus Terentius Varro）曾提出存在活病原體的思想，他認為這種病原體是極小的看不見的小生物，這些小生物會“隨着空氣通過嘴和鼻子進入人的機體，並且造成感染”。1546年，意大利醫學家弗拉卡斯托羅（Girolamo Fracastoro）又提出傳染病的產生不僅因為空氣中帶病原菌，而且也因為人和人之間直接接觸，以及使用了被染上病菌的衣服用品⁽⁶⁷⁾。1683年，荷蘭非專業的研究人員列文虎克（Antony van Leeuwenhoek）通過顯微鏡發現了細菌，從而開闢了微生物學的新領域⁽⁶⁸⁾。但是，鼠疫桿菌並沒有被發現，鼠疫的傳播途徑並不清楚。科學技術史研究的權威亞·沃爾夫曾列舉了18世紀醫學“錯過的一些機會”，其中便有1762年時，維也納人普倫齊茨曾“力陳每種類型傳染病都是某種微生物引起的，但這種觀念在18世紀末產生結果”⁽⁶⁹⁾。

這一謎底直到1894年香港鼠疫大流行才從病原學上得到科學解釋。疫病流行期間，1894年6月13日，由日本微生物學家北里柴三郎率領的研究小組到達香港，他們在肯地亞醫院設立了實驗室；兩天後，瑞士細菌學家耶爾森（Alexandre Yersin）一行抵港，在愛麗斯紀念醫院內的一間草房設立了實驗

室。他們分別對香港的疫亡者和死鼠進行解剖檢查，發現兩者的淋巴結和血液中都有大量相同的桿菌，進一步的試驗證實：鼠疫的主要傳染源是老鼠。北里和耶爾森先後於1894年7月7日和30日分別在香港報告發現首尾圓形，輕微著色的鼠疫杆狀物，同時，通過解剖在世界上首次發現淋巴腺鼠疫桿菌（兩人發現的並非同一種微生物），後以耶爾森的名字命名為“鼠疫耶爾森氏菌”（*Yersinia Pestis*），瑞士政府為此特別發行了印有耶爾森像的紀念郵票。這又是“惠及香港在醫學史上縱死猶聞俠骨香”的事件⁽⁷⁰⁾。

於此，《鏡海叢報》曾有報道：

有人言鼠死乃起疫之影，此非如是說。但有鼠死，則其地必有疫蟲，此獸之嘴，離地不過一寸，甚易嗅毒，曾為剖驗毒蟲，由鼠嘴而入，其死最速。且鼠之所居，最易傳病，故有先聲。特未有精識，將蟲安入豬牛狗身上，細為查核耳，原夫核症乃系一種可傳之熱病，揆其性質，因有一種惡蟲，最喜先行走入血，繼入腦，又入血管。一千八百九十四年六月十四日，東洋醫基礎達沙度經在港之醫院從病人之糞、之血、之身上核尋出一種毒蟲，究其何以而得，一因污垢，二因人多。⁽⁷¹⁾

報道祇是初步，未得科學真相，捕風捉影處甚多。可見當時的澳門人對鼠疫病理尚未知曉，對科學的檢驗方法感到神奇，對近代的細菌乃至病毒學說所知不多，其描述多令人發笑。

聞澳門時疫盛行，欲尋疫蟲考究，乃借其室同至鏡湖，十四日並赴醫院，親取病人所患之核察看見有外已破裂膿血膠凝者，乃以銀刀挑撥其膿，納入玻璃瓶內，視其瓶內所載之物，乃係精牛肉汁，滿浸髮菜。據言此等疫蟲最喜以髮菜為巢，其牛肉汁則藉以養育其蟲也，近已取得壹種疫蟲，質極精壯，堪養至兩年。⁽⁷²⁾

但澳門某些人也已開始認識到鼠與疫間的關係。《鏡海叢報》光緒廿一年五月十三日的論說標題就是《鼠中流疫》：

大凡有疫之地，屋內之鼠必有先為兆警者。或陰斃於溝中，或跳伏於庭畔，俄而遂死。察其屍骸，竟有目珠迸裂，其毒可謂甚焉！（……）且聞不僅水手街有死鼠之事，西洋殷富之住宅亦屬同然。傳聞此等耗子，未死之前，多有緩步遊行，梭巡堂宇，或踴躍而後斃。有某西人宅，地極清潔。耗子亦梭巡而出盤桓廳際，一日而手為擊斃者，得十八頭，沿街死鼠雖經西官派人收埋，而聞不及檢者尚多暴於烈日，蒼蠅營營，寄語行人，統宜留意。⁽⁷³⁾

當然，這些都祇是敏銳的覺察，還不能科學確認。1894年在香港發現鼠疫桿菌後，其傳播鏈並不清楚；1897年西方學者提出腺鼠疫的主要傳播媒介是跳蚤。這年，奧斯塔(M. Ogata)首次提出鼠疫借助跳蚤傳播，鼠—蚤—人的傳播鏈條開始串接，但鼠疫的傳染機制完全清晰是1914年由巴科(A. W. Bacot)所揭示。在未發現鼠疫病源之前，祇能進行漫無目標的消極防疫。

對澳門沒有出現大規模鼠疫流行的原因，東京帝國大學醫學教授青山胤通認為主要得力於那裡幾個因素：一是澳門的中國勞工移動少；二是對香港腺鼠疫的流行採取嚴格的檢疫；三是員警比香港得力；四是由於南風空氣流通好等⁽⁷⁴⁾。這祇是概略分析。其實，澳門的員警未必就比香港得力，而空氣的作用也未必有多麼重要。鼠疫有三種類型：腺鼠疫(bubonic plague)，經由寄生於帶有鼠疫病菌的老鼠身上的跳蚤叮咬而感染；肺鼠疫(pneumonic plague)，經感染人的肺部並通過咳嗽和嚏噴的飛沫而傳播；敗血鼠疫(septicaemic plague)，經血液而感染。是次嶺南流行的是腺鼠疫，並不通過空氣或病人的飛沫傳染，所以南風空氣流動的直接意義比較有限。這與2003年SARS流行的情況不一樣，SARS與空氣流通是有直接關係的。

可以看出，鑒於那個年代人們對鼠疫認識尚還有限，所以，澳門對鼠疫的傳播鏈條也不可能清楚認識，其防疫的針對性並不強（香港也祇是從1904年才開始大規模滅鼠）。據流行病學研究，傳染病流行的先決條件之一是要有大量易感人群，這樣才能保留一個傳染鏈。因此鼠疫的傳播不可缺乏的是一定數量的人群活動。澳門地區狹小，人口密度大，人員流行性強，從易感人群角度來說，具備疫病流行的人口條件。但未流行，其因何在？其中最關鍵點就是本文論述主旨為防疫的公共性。它表現在以下特性上：

普遍性，因為不能清晰認識鼠疫病源，祇能全面防疫，整個澳島，地無分南北，全行動員，建立公共性的防疫、衛生、隔離、環境、以及疫情通報等項機制，這種缺乏針對性的普遍防疫反倒是特別有效且能持久。即以環境衛生而言，不僅能滅鼠，還能根絕跳蚤等的孳生，實際上有意無意地切斷了鼠疫傳播鏈。廣州香港因為地域面積較大，人員更多，故而在防疫的普遍性上比澳島難度要大得多，往往顧此失彼。造成的結果是，1894年廣州香港的鼠疫爆發顯現為“片狀”，而1895年澳門的鼠疫流行仍局限於“點狀”。

全民性，中外人士、官紳士兵、士農工商、老幼婦孺、販夫走卒、妓女屠夫，無所不包，整體動員，全面參與，各司其責，互相監督。這裡，民眾的公共參與十分重要，這與香港等地形成較大反差，港島鼠疫流行期間，在一段時間內有很多民眾不理解政府的作法，朝野之間、中外人士之間、中西醫之間頗有衝突。而澳門則基本沒有此方面的情況，極少摩擦，全民一心，共同防疫，沒有相互力量的抵消，彼此舉措的抵牾。香港與澳門比較，整體環境上或許還要略好，特別是達官貴人的居住區，但是，港島環境差的地區比澳門則尤甚，如太平山一帶，環境惡劣，人員擁擠，貧困潦倒，而鼠疫正是在這些極度貧民區肆虐，澳門則甚少這樣的區域。

制度性，通過議事會用立法的形式頒發了《防疫條例》、《辟疫章程》、《喪葬管理條例》、《創設醫館規條》等，還對病區隔離、疫情通報、公私廁所、環境衛生、牲畜屠宰等做了一系列制度性的規範。

公益性，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因為瘟疫患者主要在貧困人群中，如果不實行防疫和治療上的廉價甚或免費，傳染源將難以從他們中根除，所以，公益性是近代公共防疫體制中最典型的表徵，1895年的澳門，在這方面，做得非常之好。一言以蔽之，公共性乃澳門避疫成功的重要秘訣。

【註】

- (1) 辭海編輯委員會編：《辭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0年版，頁2073。
- (2) [德]伯恩特·卡爾洛-德克爾(von der Antike bis zur Gegenwart)著，姚燕、周惠譯，盛望平校：《醫藥文化史》，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年版，頁244。
- (3) 賴文、李永宸：《嶺南瘟疫史》，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頁301。
- (4) 沈維遜：《鼠疫流行史》，廣東省衛生防疫站1989年印本，頁202-203。
- (5) 轉引自賴文、李永宸：《嶺南瘟疫史》頁421。
- (6) 余新忠等：《瘟疫下的社會拯救》，北京：中國書店2004年版，頁246。
- (7) 《澳地後盛論》，澳門基金會、上海社會科學院編：《鏡海叢報》光緒廿一年閏五月十一日第一頁，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0年影印本。本文所引錄《鏡海叢報》的全部資料均出自該影印本。
- (8) 有關《鏡海叢報》的全面介紹請參見費成康先生所撰《孫中山和“鏡海叢報”》，澳門基金會、上海社會科學院編：《鏡海叢報》，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0年影印本。
- (9) 《澳地後盛論》，《鏡海叢報》光緒廿一年閏五月十一日第一頁。
- (10) 《平情坐論》，《鏡海叢報》光緒廿一年四月廿八日第五至六頁。
- (11) 《譯文附言》，《鏡海叢報》光緒廿一年四月初七日第一頁。
- (12) 《請增新例》，《鏡海叢報》光緒廿一年閏五月初四日第六頁。
- (13) 《譯文附言》，《鏡海叢報》光緒廿一年四月初七日第一頁。
- (14) 《宜莫深諱》，《鏡海叢報》光緒廿一年四月初七日第五頁。
- (15) 《擇地論遷》，《鏡海叢報》光緒廿一年四月廿八日第六頁。
- (16) 《又弱一個》，《鏡海叢報》光緒廿一年四月廿八日第五頁。
- (17) 《鼠中流疫》，《鏡海叢報》光緒廿一年五月十三日第五頁。
- (18) 《譯文附言》，《鏡海叢報》光緒廿一年四月初七日第一頁。
- (19) 《再譯西報》，《鏡海叢報》光緒廿一年四月廿八日第一頁。
- (20) 《再譯西報》，《鏡海叢報》光緒廿一年五月初六日第一頁。
- (21) 湯開建、吳志良主編：《“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澳門基金會2002年版，頁245-246。
- (22) 《官調醫來》，《鏡海叢報》光緒二十年八月廿七日第六頁。
- (23) 《任怨堪嘉》，《鏡海叢報》光緒廿一年四月廿八日第六頁。
- (24) [英]亞·沃爾夫(Abraham Wolf)著，周昌忠等譯：《十六、十七世紀科學、技術和哲學史》下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頁500-501。
- (25) 《醫藥文化史》頁244。
- (26) [法]費爾南·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著，唐家龍、曾培耿等譯：《菲力浦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上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年版，頁376-377。
- (27) 《“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頁229-230。
- (28) 《善則旌之》，《鏡海叢報》光緒廿一年五月初六日第六頁。
- (29) 《辦理妥善》，《鏡海叢報》光緒廿一年五月二十日第五頁。
- (30) 《又弱一個》，《鏡海叢報》光緒廿一年四月廿八日第五頁。
- (31) 《再譯西報》，《鏡海叢報》光緒廿一年五月初六日第一頁。
- (32) 《擇地論遷》，《鏡海叢報》光緒廿一年四月廿八日第六頁。
- (33) 《擇地論遷》，《鏡海叢報》光緒廿一年四月廿八日第六頁。
- (34) 《此是何為》，《鏡海叢報》光緒廿一年六月初三日第六頁。
- (35) 《平安告慰》，《鏡海叢報》光緒廿一年二月十七日第六頁。
- (36) 《仰請留意》，《鏡海叢報》光緒廿一年三月十六日第六頁。
- (37) 《任怨堪嘉》，《鏡海叢報》光緒廿一年四月廿八日第六頁。
- (38) 《請即嚴查》，《鏡海叢報》光緒廿一年四月廿八日第六頁。
- (39) 《醫藥文化史》頁244。
- (40) 《仍須官辦》，《鏡海叢報》光緒廿一年三月廿三日第五頁。
- (41) 《願為留意》，《鏡海叢報》光緒廿一年五月初六日第六頁。
- (42) 《譯文附言》，《鏡海叢報》光緒廿一年四月初七日第一頁。
- (43) 《普遍毒鼠完成，剿滅鼠類萬五》，《福建時報》1947年3月13日。
- (44) 《異論超奇》，《鏡海叢報》光緒廿一年五月初六日第六頁。
- (45) 《“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頁245-246。
- (46) 《又弱一個》，《鏡海叢報》光緒廿一年四月廿八日第五頁。
- (47) 《時疫彙記》，《鏡海叢報》光緒廿一年四月廿一日第五頁。
- (48) 《又弱一個》，《鏡海叢報》光緒廿一年四月廿八日第五頁。
- (49) 《仰請留意》，《鏡海叢報》光緒廿一年三月十六日第六頁。
- (50) 《“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頁245。
- (51) 《鼠中流疫》，《鏡海叢報》光緒廿一年五月十三日第五至六頁。
- (52) 《民情上籲》，《鏡海叢報》光緒二十年九月初三日第五頁。
- (53) 《示禁曬糞》，《鏡海叢報》光緒廿一年二月十七日第六頁。
- (54) 《未知何意》，《鏡海叢報》光緒廿一年三月廿三日第五頁。
- (55) 《私屠病畜》，《鏡海叢報》光緒廿一年正月十二日第六頁。
- (56) 《妖言可笑》，《鏡海叢報》光緒廿一年四月廿一日第五頁。
- (57) 《遇赤帝子》，《鏡海叢報》光緒廿一年五月十三日第六頁。
- (58) 《善則旌之》，《鏡海叢報》光緒廿一年五月初六日第六頁。
- (59) 《同心祈福》，《鏡海叢報》光緒廿一年四月廿一日第六頁。
- (60) 《酬答神恩》，《鏡海叢報》光緒廿一年六月初三日第六頁。
- (61) 《靈神返駕》，《鏡海叢報》光緒廿一年五月十三日第六頁。
- (62) 《時疫已靜》，《鏡海叢報》光緒廿一年閏五月初四日第六頁。
- (63) 《請增新例》，《鏡海叢報》光緒廿一年閏五月初四日第六頁。
- (64) D. MacGillivray,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807-1907)*, San Francisco, 1979, pp. 591-593.
- (65) 《醫藥文化史》頁244。
- (66) 曹樹基：《鼠疫流行與華北社會的變遷(1580-1644)》，《歷史研究》1997年第1期。
- (67) 《醫藥文化史》頁236。
- (68) 《十六、十七世紀科學、技術和哲學史》下冊，頁486。
- (69) [英]亞·沃爾夫(Abraham Wolf)著，周昌忠等譯：《十八世紀科學、技術和哲學史》下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頁577。
- (70) 參見《香港醫學博物館開幕紀念特刊》頁58-59。
- (71) 《照譯西報》，《鏡海叢報》光緒廿一年四月十四日第一頁。
- (72) 《不憚煩勞》，《鏡海叢報》光緒廿一年五月二十日第五頁。
- (73) 《鼠中流疫》，《鏡海叢報》光緒廿一年五月十三日第五至六頁。
- (74) 轉引自《瘟疫下的社會拯救》頁255。